

**WEIXIN
YUNDONG**

王
栻
遗著

维新运动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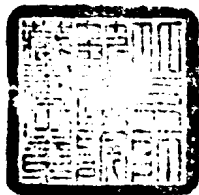


维新运动

王 栻 遗著



21080849



上海人民出版社

1080349

责任编辑 张 臻
封面装帧 范一辛

维 新 运 动

王 棫 遗著

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

(上海绍兴路 54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群众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2.5 插页 6 字数 286,000

1986 年 5 月第 1 版 198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4,100

书号 11074·694 定价 2.75 元

维 新 运 动

(代前言)

近代中国的维新变法思想,旨在以资本主义取代封建主义。这种思想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酝酿,发展到1898年(清光绪二十四年,岁次戊戌),终于出现了6月11日至9月21日的“百日维新”,史称“戊戌变法”。由于慈禧太后为首的地主阶级顽固派发动政变,这次变法迅速失败,但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(改良)运动,它的重大进步意义却不可磨灭。正如毛泽东所指出: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,“先进的中国人,经过千辛万苦,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”。而康有为等维新派,就“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”。①

维新运动的历史,可分为三个时期:第一期,从1875年左右到1895年,是酝酿时期,维新思想在个别人的著作中表现出来;第二期,从1895年到1897年,是发展时期,小规模群众性的维新活动不断涌现;第三期,1898年,是高潮时期,维新派依靠光绪皇帝,尽其所能,从中央政权发起较大规模的全面改革。所谓“百日维新”,便是高潮的顶峰。

戊戌变法是在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的背景下发生的,是一场维新派发动的爱国救亡运动。它虽然失败了,却并不能因此抹煞其阻止列强瓜分的作用。唯有这样的认识,才与对义

① 《论人民民主专政》,《毛泽东选集》(竖排一卷本),第1474页。

和团运动的评价标准一致。十九世纪末中国之所以未被瓜分，是维新派、义和团以及清朝爱国官兵共同努力的结果，是中华民族除卖国败类外，共同奋斗的结果。尽管他们的功劳有大有小，却不能单独归功于义和团，而排除维新派。

维新派并不打算从根本上消灭封建制度，他们企图以日本为榜样，把君主专制改造成“君民共主”的君主立宪制，而让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参与政权。这就不是封建社会内部的自我调节，而是社会制度性质的改变。近有论文考证，康有为在“百日维新”期间，并没有明确提出“设议院”、“开国会”、“立宪法”，反而主张“开懋勤殿”、“开制度局”。这一新发现并不影响这场运动的资本主义性质。因为戊戌变法是在刚刚起步时就被扼杀的。不应当根据运动的起点去判断它的性质，而应当根据维新派的一贯宗旨，去推断运动前进的方向。更何况在“百日维新”期间，维新派的建议和光绪皇帝的诏旨，都必须更多地照顾到现实的可能。制度局是新政决策机构，“设议院”等制度法令，都应该在懋勤殿上商议成熟，再由皇帝以诏书的形式颁布。那么，“开制度局”、“开懋勤殿”与“设议院”、“开国会”、“立宪法”就没有矛盾。康有为又何尝背弃自己的政治理想呢？至于经济方面，康、梁维新派虽然没有触及封建土地所有制，但他们要求保护和自由发展近代工商业、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，并振兴农业，为正在发展中的民族资本主义开辟道路、提供方便。所以说，戊戌变法在政治、经济两方面的资本主义性质，是确定无疑的。

戊戌变法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资本主义启蒙运动，是一次空前的思想大解放。维新派集会结社、上书言事，打破了朝廷的禁令，改变了社会的风气。他们致力于“开民智”、“育人才”，废科举、办学堂、设报馆、译西书，大力引进和传播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知识。从此，“天赋人权”、“自由平等”

之类思想,在中国的土地上扩散开来,对于几千年的封建的传统思想文化,造成了巨大的冲击。十九世纪末,初生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没有做大量的宣传工作,维新派恰恰在思想启蒙方面弥补了他们的不足。在当时,维新派开创的“新学”,“有同中国封建思想作斗争的革命作用,是替旧时期的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服务的。”^①

康有为和梁启超在变法失败后流亡国外。他们坚持君主立宪的立场,组织保皇派,反对革命党。但在1903年之前,主要矛头针对的是慈禧太后为首的地主阶级顽固派。1900年唐才常自立军起事,就说明康、梁维新派企图用武力推翻后党政府。清朝灭亡后,康有为反对袁世凯称帝,反对军阀割据的“联省自治”,并且在五四运动时发了《请诛国贼救学生》的通电。无论其主观动机如何,这些行为在客观上具有进步意义。同时,康有为却甘心充当矢忠清室的遗老,参与张勋复辟,妄图推翻民主共和制,则又成了倒转历史车轮的不识时务者。联系严复晚年参加“筹安会”、拥护袁世凯称帝一事,可见先进的思想家一旦落后于形势,也会做出贻笑后人的蠢事,被历史潮流所淘汰。梁启超在清朝灭亡后的政治态度,比康有为进步些。他虽一度拥护袁世凯,但他反对日本提出的灭亡中国的“二十一条”;策划、组织、参与了反对“洪宪帝制”的护国运动;并且坚决反对张勋复辟。可以这样认为,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历史上仍然发挥了较大的积极作用。

近代中国是在世界走向资本主义的历史潮流中,在比西方落后一、二百年的状况下,在面临亡国的危险时刻,背着沉重的封建包袱跑步前进。这样,就形成了区别于西方国家的许多特点。特点之一,就是政治、经济、思想三方面的发展极不平衡。那时,先进的思想家只需从资本主义世界去寻找现成的思想武器,

^① 《新民主主义论》,《毛泽东选集》(竖排一卷本),第690页。

加以承认、吸收和传播，所以思想的发展最为迅速。从林则徐、魏源的开明思想，到康有为、梁启超的维新思想，再到孙中山的革命思想，只花了五十多年时间。相反，经济的发展就不那么容易，并且总是落在思想发展的后面。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林则徐、魏源提出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，可是到六十年代中国才出现仿制洋枪、洋炮的洋务工业；1859年洪仁玕的《资政新篇》已有发展资本主义的意图，可是直到1869年中国才出现第一个民族资本主义企业——上海发昌机器厂。以上情况说明，在中国近代史上，不是由于经济的相当发达而酝酿出先进思想，从而导致政治运动；相反，经济的发展有待于某一个政治变革的成功，有赖于政权机构所采取的政策措施。戊戌维新就是典型的例子。据统计，戊戌变法前民族资本主义企业共有一百多个，资本总额约一千七百万两。这一百多个企业中，能有多少个民族资本家？能否称为阶级？值得认真推敲。即使承认此时民族资产阶级已经初步形成，它也是非常幼稚、非常弱小的，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还依赖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的洋务派。那么，以如此初步的经济发展，以如此弱小的阶级力量，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中，就已有全面变革甚至夺取政权的强烈要求了吗？从这一角度考虑，戊戌变法是维新思想家成熟的表现，而不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已经觉悟的标志；“君主立宪”表明了维新派所达到的思想高度，却并不等于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已经产生了这样的阶级要求。

戊戌变法是走在经济发展和阶级成长的前面了。它之所以超越经济发展程度，取决于两个因素：一方面，维新思想经过二十多年的酝酿，已经形成体系，维新派决心把思想付诸行动，以政治的手段去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；另一方面，瓜分危机迫在眉睫，救亡图存刻不容缓，客观形势不允许维新派再拖延。正因为这场运动的思想动因和政治动因如此突出，所以在评价历

史时,谁都承认戊戌变法是一场思想启蒙运动和爱国救亡运动。但是,这场改革的资本主义性质,却无法从参加和领导这一运动的阶级力量反映出来,并且也难以在经济背景中找到很有说服力的证据。于是,出现众说纷纭,甚至认为实行了洋务派的路线。

事实上,正因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幼稚弱小程度,与维新思想家的成熟程度不相称,这才造成了戊戌变法的特殊现象: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与自己的政治代表脱节。正当康、梁维新派依靠光绪皇帝发号施令之时,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却根本没有组织起来,当然也不会有多少积极的政治行动。近有论文指出,戊戌变法期间,早期维新思想家郑观应埋头“实业”,未参与政治活动;著名的民族资本家经元善虽有一些个人的活动,但这些活动与康、梁维新派之间,却并没有组织联系。清末的立宪运动,才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初步成熟和觉悟的表现,才是严格意义上的阶级的行动。所谓“立宪派”,才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在经济实力发展和阶级队伍壮大的基础上,自然产生的政治派别。但是,在戊戌变法期间,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作为一个阶级阶层的政治行动,是不存在的。这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改革运动在当时注定要失败的根源。诚如历史事实所表明,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戊戌变法作为一场爱国救亡运动或者思想启蒙运动,可以获得成功;但作为一场以君主立宪为目标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经济改革,却缺乏阶级力量作为后盾,因而没有成功的可能。康、梁维新派在这种特殊情况下,当然只能去争取皇帝的支持,并与帝党结成联盟。平心而论,在几亿人口的大国,有什么理由责怪一百多个企业所组成的“民族资产阶级”及其政治代表“软弱”呢?又有什么理由责怪维新派“依靠皇帝”、“自上而下”呢?当然,变法失败的原因不可能是唯一的,应该从多方面进行深入的探讨。但是,决不能因为它失败,就把它的全部意义归结为:“证明了改良主

义道路走不通”。因为维新运动在当时还是一种新事物，是搅乱封建统治的一种冲击力量。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治运动，无论其代表人物采用维新变法的形式，或者采用武装革命的手段，都应该允许尝试，允许失败，允许他们为本阶级积累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。

王枬先生原是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，多年从事维新运动史的研究，生前著有《严复传》等著作。本书是他一生心血的结晶，具有以下三方面的特色：一是作者继承和发扬了中国史学的“朴学”传统，力图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指导下，用大量的史料说明问题，因而言之有据，史实可信；二是作者叙述维新运动的历史时，并没有局限于“百日维新”，也没有局限于戊戌年，而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讲起，详尽地介绍了早期维新思想的产生和发展。这样就雄辩地说明了：1898年的改革运动，是二十多年维新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，而不是帝、后党争所引起的权力冲突，也不是由于康、梁“躁进”而引起的突发政治事件；三是由于维新运动本身就是一次资本主义性质的思想启蒙，因此作者力图反映一种时代思潮，而不满足于一、二个代表人物的介绍。尤其是在叙述甲午战争前的维新思潮时，将前后左右十几位历史人物分类比较考察，进行综合研究。这样的论述，就有了一定的深度。

1983年9月，全国规模的维新运动学术讨论会在广东举行。这次讨论会对维新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，并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，提出了一些新的问题。如维新运动与洋务运动、辛亥革命的关系如何？变法过程中，维新派与洋务派的关系如何？光绪皇帝的“百日诏书”，究竟实行了洋务派的路线，还是维新派的路线？维新运动的性质，究竟能否称为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，或是具有资产阶级倾向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政治运动，或

者竟是一场改良主义运动？戊戌时代，君主立宪制是否更适合中国的国情？“百日维新”期间和以后，康、梁的思想倾向有没有倒退？诸如此类的问题的提出，以及众多分歧的存在，恰恰反映了这一学术领域的繁荣兴旺。可以相信，维新运动史的研究，今后将会取得更大的进展。

本书原写于1960年，1964年由南京大学铅印作为教材。1981年，王栻先生在夫人陈秀梅和五子王平的协助下，进行了较大的修改。他增加了第四章的篇幅，补写了容闳、郭嵩焘、宋恕等早期维新人物的内容，并对五、六十年代盛行的“改良主义”等提法，作了原则性的订正。1982年2月11日，王栻先生突然因脑溢血昏迷，中止了本书的定稿工作。因此，本书主要只能反映他五、六十年代的研究成果。

我作为他的学生，从1982年12月开始承担书稿的整理工作。整理时首先核对了史料，校正了引文，并为数十条史料补做了脚注。其次重写了“前言”，并改写了第一章的第一节和第四章的第五节。对原稿的其余部分，则仅限于文字润饰。此外，还补做了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卒年里简注，并按统一规格重写了全部脚注。

整理过程中，得到汤志钧先生的指点，并得到了孙应祥、胡伟希、钱宪民、姚杏民、经盛鸿等同志的帮助。上海人民出版社张臻同志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，重新拟写了目录，并代选照片作为插图。在此，谨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！

王栻先生不幸于1983年2月13日谢世，本书的出版，就是最好的纪念。

俞 政

1984年1月

DA53/17

目 录

图 片

维新运动(代前言)	(1)
第一章 甲午战争前维新思想的酝酿	(1)
第一节 维新思想的先驱者	(1)
一 龚自珍	(1)
二 林则徐	(10)
三 魏 源	(20)
四 冯桂芬	(26)
第二节 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	(36)
一 产生的历史条件	(36)
二 发展的一般情况	(38)
三 甲午战争前民族资本主义的特点	(41)
第三节 早期维新思想的代表人物	(45)
一 资本主义文明熏陶的知识分子	(47)
二 背离传统思想的士大夫	(54)
三 洋务运动中分化出来的官僚、买办	(61)
第四节 早期维新思想的内容	(68)
一 反对条约特权,要求自主独立	(70)
二 反对官办政策,要求民办企业	(76)
三 反对君主专制,要求议会政治	(84)

第二章 甲午战争后维新运动的蓬勃发展	(102)
第一节 维新运动蓬勃发展的历史条件	(102)
一 民族危机的加深	(102)
二 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涨	(109)
三 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	(110)
第二节 北京地区的维新运动	(116)
一 公车上书	(116)
二 请求变法	(120)
三 强学会的成立	(125)
四 强学会封禁以后	(130)
五 天津《国闻报》	(134)
第三节 上海地区的维新运动	(137)
一 1895 年前的上海思想界	(137)
二 上海强学会	(139)
三 上海《时务报》	(145)
四 学会、学堂、报馆的继起	(148)
第四节 湖南的维新运动	(154)
一 初期新政	(154)
二 民权思想的传播	(158)
三 守旧劣绅的攻击	(166)
第五节 两广的维新运动	(171)
第三章 维新运动参加者思想剖析	(177)
第一节 维新运动的领导者——康有为、梁启超	(182)
一 甲午战争前的康有为	(182)
二 康有为与“孔圣人”	(187)
三 康有为的大同说	(191)
四 康有为的现实政治纲领	(198)

五	康有为的助手梁启超	(203)
第二节	激进的维新志士谭嗣同	(215)
一	激烈变化的谭嗣同思想	(215)
二	《仁学》对封建道德及专制政治的批判	(221)
三	在反封建中的革命倾向	(225)
四	勇于献身的改良派	(229)
第三节	温和的维新人士严复	(233)
一	甲午战争前的严复	(233)
二	反对专制政体的民主思想	(237)
三	《天演论》	(245)
四	创办《国闻报》	(251)
五	维新运动中的实际活动	(255)
六	严复思想的理论基础	(258)
第四节	维新运动中的“帝党”	(262)
一	所谓“帝党”人物	(262)
二	“帝党”与强学会	(267)
三	“帝党”与维新派	(275)
第五节	张之洞与维新运动	(282)
一	从“清流”名士到洋务大员	(282)
二	在维新运动中的投机活动	(285)
三	《劝学篇》	(293)
第四章	百日维新及其失败	(301)
第一节	维新运动进入高潮	(301)
一	严重的民族危机	(301)
二	康有为加紧变法活动	(304)
三	维新派与帝党登上政治舞台	(309)
第二节	百日维新	(313)

一	百日维新大事记	(313)
二	选拔人才	(326)
三	文教方面的改革	(330)
四	经济方面的改革	(336)
五	政治方面的改革	(340)
六	立宪与议会问题	(345)
第三节	戊戌政变	(347)
一	慈禧太后发动政变	(347)
二	恢复旧制	(352)
三	杀捕维新人士	(354)
四	幽禁光绪帝	(357)
第四节	列强在政变前后的活动	(359)
一	广学会	(359)
二	政变前的活动	(367)
三	政变后对维新人物及光绪皇帝的“保护”	(369)
四	两种策略的分歧	(376)
第五节	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	(380)

第一章

甲午战争前维新思想的酝酿

第一节 维新思想的先驱者

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产生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，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意识的维新思想，只能出现于此后。因此，维新运动的历史，可以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讲起。但为了提供近代思想演变的线索，阐明维新思想的历史背景，有必要先介绍几位著名的思想家——龚自珍、林则徐、魏源和冯桂芬。这些人，是维新思想的先驱者。

一 龚 自 珍

1839年，龚自珍从北京辞官南下，一路上写了三百多首杂诗，其中一首写道：

不论盐铁不筹河，独倚东南涕泪多。

国赋三升民一斗，屠牛那不胜栽禾？^①

诗的第一句抨击了昏庸腐朽的清朝统治者，最后两句则以沉痛的心情，描绘出人民的悲惨生活。这首诗，可谓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生动的艺术写真。

^① 《己亥杂诗》，《龚自珍全集》，第521页。

龚自珍生活的年代，清朝已由盛转衰。全国土地高度集中，人民生活极端贫困。据统计，嘉庆年间皇庄多达一千零七十八处，占地面积三万五千七百多顷。^①道光朝的直隶总督琦善，占有土地二百五十六万余亩。^②那时，官员们贪污成风，统治集团的腐朽到了惊人的地步。嘉庆皇帝惩办大贪官和珅时，籍没家产价值数万两。^③而1843年（道光二十三年）清查户部库银时，竟发现九百二十五万二千多两的亏空。^④官场中充斥着苟且敷衍、庸懦趋奉之风。道光皇帝的师傅、大学士曹振镛教人做官的秘诀，便是“多磕头，少说话”。^⑤在这种情况下，人民群众起而反抗。1796年，声势浩大的白莲教起义蔓延湖北、四川、河南、陕西和甘肃五省，并坚持了八年之久。1813年，又有天理教发动起义，一部分人冲进了紫禁城。道光朝各地各族人民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，几乎无岁不有。

与此同时，资本主义列强加紧向中国输出鸦片，掠夺财富，加速了中国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。

总之，鸦片战争前的中国社会，正是一派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情景。而龚自珍，就是当时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中极为敏感的人物。

龚自珍，又名巩祚，字璚人，号定盦，浙江仁和（今杭州）人。生于1792年（乾隆五十七年）。祖父龚敬身，当过道员，父亲龚丽正，署理江苏按察使。他十一岁时随父亲到北京，二十一岁由

① 苑书义等：《中国近代史新编》上册，第2页。

② 李文治编：《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》第一辑，第69页。

③ 据薛福成记载，和珅拥有赤金五百八十万两，生沙金二百余万两，元宝银九百四十万两，当铺七十五座，银号四十二座，地亩八千余顷，另有大批财物。已估价的二十六号清单合计价银二亿多两，还有八十三号清单未估价。见《庸庵笔记》（新文化书社1935年版），第49—54页。

④ 《大清宣宗成皇帝实录》卷三百九十，第32页。

⑤ 朱克敏：《隰菴杂识》。

副榜贡生考充武英殿校录，二十七岁中举。二十九岁为内阁中书。先后五次考试，到三十八岁才赐同进士出身。四十四岁擢宗人府主事，四十六岁迁礼部主事。先后仕宦二十多年。1839年辞官南归，1841年在江苏丹阳的云阳书院任讲席，同年9月26日（道光二十一年八月十二日）暴卒于丹阳县署，终年五十岁。

龚自珍具有家学渊源。外祖父段玉裁^①是清代著名的古文学家。龚自珍十二岁时，段玉裁就授以《许氏说文部目》。二十三岁时，龚自珍写成《明良论》四篇。八十岁的段玉裁看后深为欣赏：“四论皆古方也，而中今病，岂必别制一新方哉？毫矣，犹见此才而死，吾不恨矣。”^②这几句话的含义，显然一方面赞美这位外孙的文章才华，一方面又暗劝他专谈考据，不要多谈政治，喜开新方，以此得祸。可是，龚自珍并没有接受他外祖父的劝告，基本上摆脱了考证训诂的圈子，走上了经今文学派的道路。那时，段玉裁与王念孙、王引之父子^③等人的考据学，只是寻求群经的章句解释，而经今文学派所寻求的，是《春秋》中的“微言大义”，要从经文的一二字中，看出圣人们“治国平天下”的大道理。龚自珍二十八岁时从刘逢禄^④学《公羊春秋》，以后遂一意钻研今文学。龚自珍与他的前辈不一样，不但敢于根据经文议论古代的政治，还进一步议论当代的政治。这在满族贵族统治的淫威下，一般知识分子是做不到的。除《明良论》外，他还写了《平均篇》、《乙丙之际箸议》、《尊隐》、《西域置行省议》、《农宗》等重要的政

① 段玉裁（1735—1815年），字若膺，号茂堂，江苏金坛人。

② 《明良论四》篇末附记，《龚自珍全集》，第36页。

③ 王念孙（1744—1832年），字怀祖，江苏高邮人。王引之（1766—1834年），字伯申，江苏高邮人，王念孙之子。

④ 刘逢禄（1776—1829年），字申受，江苏常州人。